

工农兵大学生

时代的宠儿

命运的厚礼

教育革命的战场

多事的1976

开门办学

毕业三十年再聚首

张河通

工农兵大学生与新大学生

他们是最具中国时代特色的一代大学生。

他们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赶上了上山下乡，赶上了推荐上大学，赶上了改革开放。时代赋予他们特殊的青春、特殊的使命、特殊的爱情、特殊的命运……

王金昌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工農兵大學生

王金昌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工农兵大学生 / 王金昌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ISBN 978-7-02-010511-3

I. ①工…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9533 号

责任编辑 陈彦瑾

美术编辑 刘 颖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70 千字

开 本 890×1290 毫米 1/32

印 张 9.25 插页 3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511-3

定 价 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献给上世纪七十年代毕业的百万大学生！

工农兵大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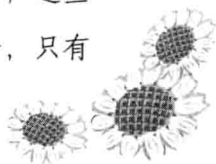


保留历史真相的珍贵档案（序）

贺绍俊

王金昌的《工农兵大学生》是写推荐制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工农兵大学生，对于今天的八〇后、九〇后们来说也许是一个比天文学、粒子物理学的术语还要显得陌生的词语。但这个词语蕴含着相当丰富的历史内容。

工农兵大学生是“文革”期间的产物。我是经历过“文革”这段岁月的人，因此突然面对“工农兵大学生”这个已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的词语时，会有许多的历史记忆从脑海深处浮上来。工农兵大学生指的是“文革”期间执行的一种新的教育制度下的大学生，因为这种教育制度采取的是推荐制，通过行政部门从工农兵中推荐上大学的人，所以这些大学生统称为“工农兵学员”（后来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我们还会想到一些“文革”特定时代的人物称谓：红卫兵、赤脚医生、知识青年、“五·七干校”下放干部，等等。“文革”结束了，这些人物称谓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终结了它们的历史使命，只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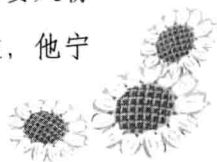


在历史叙述中才会出现。但是，我发现历史叙述对待这些人物称谓明显地采取了一种“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伦理观的态度。凡是在“文革”中处于被动地位的人物称谓，在历史叙述中就被赋予一种历史优越感，如知识青年、“五·七干校”下放干部；凡是在“文革”中处于主动地位的人物称谓，在历史叙述中则处在被贬责、被否定甚至被妖魔化的境遇之中，如赤脚医生、工农兵大学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启的新时期文学基本上就是以这样一种历史伦理观建构起新时期的文学叙述的，而叙述主体便是五七干校里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他们掌握了历史话语权，完全以他们的心态、立场和视角去观照、筛选历史。在以他们为主体建构起来的“文革”叙述里，类似于工农兵大学生、赤脚医生等人物几乎就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这样的历史叙述显然是应该被质疑的。因为作为叙述主体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他们并没有走出历史，更没有超越历史，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构起来的历史图景显然不可能全面地反映历史的本质。所以我们应该以另一种历史人物的视角来观察历史，这样才能打破僵化的历史叙述格局。范小青前些年写了一本《赤脚医生万泉和》，我读后大为赞赏，就因为她是

以一位赤脚医生的视角来写“文革”的，与我们平时看到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所讲述的“文革”受难史完全不一样。王金昌的《工农兵大学生》则是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视角来写他们自

己在“文革”前后的经历。在我的印象里，完全以工农兵大学生为主要角色来讲述历史的小说几乎没有，他们早已退出了人们的视线，《工农兵大学生》第一次让工农兵大学生站到了舞台的中心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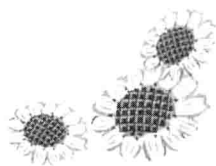
王金昌是以忠实于历史真相的态度来写《工农兵大学生》的。他说：“我不想批判谁，也不想歌颂谁，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只想真实地刻画一群生活在那个时代那样的人。”我们平时都说要忠实于历史，我们也以此作为衡量历史文学作品的一条标准。但事实上要完全做到忠实于历史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首先就要摆脱历史观的制约。历史叙述要么是建立在“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伦理观的基础上，要么就反其道而行之，以颠覆的方式重写历史。王金昌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与这两种状况都没关系，他的历史叙述建立在他的历史记忆的基础之上。因此他不对故事情节作太大的虚构，不为了故事结构的完整性而牺牲历史的真实性。他尽量保持生活原型的原生态，这也就带来一个结构上的特点：多线索的、并行独立的发展。王金昌写了好几位工农兵大学生，有从部队来的王建国，有被县教革委主任看上欲招为女婿才进了大学的吕志军，有下乡知青王思哲，还有已经当上省革委副主任却要补上文化知识这一课的严凤英，等等。按一般的小说写法，就会在这几个主要人物之间重新设置关系，发展情节。但王金昌并没有这么做，他宁



可让几个人物处在游离、松散的状态之中，也不愿意破坏人物的自然状态，因此从小说的角度看，作品缺乏情节逻辑，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部历史档案来看的话，这就是一部没有被人为破坏的、保留着历史真相的珍贵档案。历史真相是由细节构成的，《工农兵大学生》中有大量的看似无关宏旨的细节。如华大哲学系的工农兵大学生到红星农场学农，值日的同学在分饭的木桶底部发现一只死蛤蟆，“把他们吓得魂飞魄散，可看着各组已经吃得正香的师生们，他们就没敢声张，匆匆扔掉完事”；如华大的工农兵大学生去部队学军，同学们争做好事，冯淑萍给战士洗被褥时发现战士被褥上有些脏东西怎么也洗不干净，觉得很奇怪，结过婚的学员严凤英知道是怎么回事，报告给校领导，从此宣布女生不能给战士洗被褥了。这样的细节，就像是生活中的插曲，并不影响故事情节的发展，也并不承载意义的阐释，也正因为它们不承载意义的阐释，让我们很难将它们安放在被建构起来的历史框架之中。历史的建构是在大大牺牲了历史的丰富性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哪怕看上去最完美的历史建构，我们也应该持有质疑的态度。

作为过来人，王金昌的写作显然带有情感的因素，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写出《工农兵大学生》几乎就成了我的使命的一部分，那是一种牵肠挂肚的眷念与惆怅。”但王金昌并不是要做一篇翻案的文章，他不过是通过一种真实的叙述来了却自

己的心愿。面对王金昌的心愿，我特别感慨的地方是，一个人的真实本性小于一个人的社会符码。“文革”之后，工农兵大学生成为一个被贬值的身份证明。《工农兵大学生》客观真实地写到严凤英、王思哲、吕志军等人在“文革”后遭到的歧视，他们有才华却不能发挥，有志向却无处施展，这一切皆因他们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我们曾经用以批判自然人性的理论依据。其实马克思并没有否认自然人性的存在，他只是强调社会属性在决定人的命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大概是生活在社会之网中的每一个人都无法摆脱的宿命，我们几乎都被各种社会符码所包裹，无法自由地伸展身体，这不仅仅是工农兵大学生才遭遇到的事情。王金昌写这部作品，试图还被妖魔化的工农兵大学生一个清白。但他也表达了一个挑战社会不公的理想：“一个个当初或宏大或渺小的词语标签，注定要被活在当下的一个个有血有肉、用奋斗来证明自我的个人所取代。”



那个时代，那样一群人（自序）

在每个苍老或年轻的面孔背后，都隐藏着一段历史；将那些相同的或相似的历史连纵起来，就形成了一个时代人的共同的记忆，今天我们叫它为“故事”。在这个将怀旧作为时尚的年代，让我们用真实的心灵去唤醒那些属于特殊时代的人的故事。它不仅仅是一些人的故事，更是一个时代的故事，细细品味它将深深感觉时代脉搏的跳动。他们出生的年代、受到的教育和经历的事件，造就了他们的性格，乃至命运，他们此后的人生也被标注上许多共同的符号，乃至成为一代具有典型时代印记的人。

——大意取自于纪录片《出生在五十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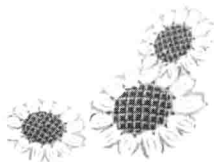
《工农兵大学生》最早构思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当时，我还是个文学青年，也曾写过被评为“生机盎然”的小说作品。后来行政工作的担子越来越重，我曾一度远离了文学。但是，自己难忘于所经历的那个特殊时代的人和事，将

之以文学形式表达出来的想法，一直都没有放弃。随着年龄的增长，怀旧思绪越发浓烈，写出《工农兵大学生》几乎就成了我的使命的一部分，那是一种牵肠挂肚的眷恋与惆怅。我似乎必须拿起笔，书写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成长、我们的浪漫、我们的艰难跋涉、我们的成功，书写最具中国时代特色的一代大学生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的命运。

让我重新拿起笔写《工农兵大学生》的，是我的一位同龄人朋友。他在一个偶然的时机看到了我当年写的那篇初稿，说像是回到了那个年代。他说，看到小说中提到的《工农兵学员之歌》的一些词句，内心有一种冲动，直想哭。他把那首《工农兵学员之歌》唱了出来：

迎着灿烂的阳光，
肩负党和人民的希望，
我们工农兵学员，
来自祖国四面八方。
带着工人阶级的嘱托，
带着贫下中农的期望，
带着革命部队的传统，
走向教育革命的战场。
壮志凌云，红心朝阳，



永远和工农相结合，
前进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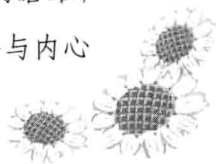
迎着灿烂的阳光，
肩负着党和人民的希望，
我们工农兵学员，
青春似火，意志如钢。
努力攀登科学的高峰，
要为无产阶级争光，
牢记毛主席的教导，
面向三大革命的课堂。
又红又专，茁壮成长，
永远和工农相结合，
前进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

《工农兵学员之歌》是百万工农兵大学生自己的歌，是他们的青春之歌，是他们永远无法忘怀的时代之歌。朋友说，这样的词句、这样的旋律，只有我们这样的过来人，才能感受到其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感受到那个时代活生生的生活，感受到那个时代跳动着的脉搏，感受到那已经逝去的青春岁月。朋友的话，重新唤起了我对一代人命运的追索和思考。

工农兵学员（后来称之为“工农兵大学生”）是三十年前的一批特殊的知识青年。据统计，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大学停止招生，到1977年恢复高考，这十年间曾出现过一大批工农兵大学生。从1970年到1976年，全国各高等院校共招收九十四万名基于推荐制的工农兵大学生。他们的学习基础确实参差不齐，但他们大多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们能吃苦、肯钻研，学到了一些在那个年代显得十分宝贵的科学文化知识。他们中后来涌现出了不少人才，在中国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比如《工农兵大学生》中提到的用于数字计算的计算机向商用管理计算机转化，就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一项技术变革。粉碎“四人帮”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这些人很快进入了角色，填补了青黄不接的人才空白。

工农兵大学生，来自于基层，了解基层疾苦，与工农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相同的命运；他们有实践经验，进大学学习理论，毕业走向社会，适应工作能力强；他们从群众中来，能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在他们中间成长出一大批领导干部和学术带头人。

当我再次拿起笔后，多年前的那一群人的面孔就渐渐浮现在眼前，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他们的经历，他们的磨难，他们对于不公平命运的抗争，他们极力要从外在的羁绊与内心



的深渊中挣脱而做出的种种选择，常常让我心潮激荡，甚至夜不能寐。写出百万工农兵大学生的命运似乎就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面对如此宏阔和沉重的题材，我有些力不从心。所以，这部作品写得相当辛苦，数易其稿。虽然这部作品还有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完成之日，我如释重负。

在这部作品中，我不想批判谁，也不想歌颂谁。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只想真实地写出一群生活在那个时代那样的一群人。告诉人们曾经有一群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经历了怎样的彷徨、怎样的无奈、怎样的磨难；在跌宕起伏的命运面前，他们并没有低头，没有气馁，没有沉寂，没有被淹没，而是不断地努力，不断地抗争。他们在中国大变革的初始，能够抓住时代机遇，成功地得以转型，并由此走进了新的时代，开创了新的生活。

列宁说过，一个人经历了一场运动，未必懂得这场运动。我愿意用此书与百万工农兵大学生、千万知青及广大读者一起体验和回味那个时代，一起体验工农兵大学生们的特殊命运。

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描写知青、老三届命运的作品很多，但真正描写工农兵大学生生活和命运的作品却很少，工农兵大学生似乎被时代和历史遗忘了。工农兵大学生是一个重大题材，作为一种教育体制，在中外教育史上也是罕见的，值得书写，值得历史铭记，值得为这一代“空前”的“大普”学历人（1993

工农兵
大学生